

# 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 清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sup>\*</sup>

张少娜

---

**【摘要】**在清初的历史语境下，“由实学兴教化”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契合百废待兴的时代命题。然而，进入雍乾时期，地方政治因人地矛盾升级而亟须革新，皇帝在用人铨选方面也因此有所变化。雍正、乾隆不再推崇康熙时期颇受重视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为了谋求政治生存空间，理学官僚遂贯彻技术性政策于地方治理中，并由此实现了向技术官僚的转型。这一过程既缘于外部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也是理学官僚力行践履时的自我觉醒与进化，体现了清代官僚政治因时、因势而变的特征。

**【关键词】**清代官僚政治 理学官僚 技术官僚 政治生存 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张少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2)11-0116-16

---

## 一、引言

《清儒学案》在总结乾隆时期理学官僚尹会一的事功时，称其“为学务在力行，于古今学术纯驳，审择之而未尝攻斥”。<sup>①</sup>也就是说，尹会一注重践履而鲜少专论儒理。依此，尹会一对18世纪求真务实的政治环境应当颇为适应才是，然而揆诸史实却不尽然。雍正五年（1727年）至雍正九年，

---

\*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清代政治文化与公共权利的設置与运行”（2017TS1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62《健余学案·尹先生会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09页。

尹会一担任襄阳知府期间因赈济穷黎、端正民风等敦本务实的政治举措而声名颇佳，当他离任时，“襄中绅士兵民，焚香祖道，垂泪献觥相属，纪公善政，绘图为诗歌”。<sup>①</sup> 出任河南巡抚后，尹会一沿袭其理学官僚治理模式，劝课农桑、敦风厉俗、兴行教化。根据《尹少宰奏议》，尹氏在任上前后上奏 67 次，其中涉及农桑、赈恤、风俗等利民生方面的奏折就有 50 件之多。<sup>②</sup> 尹会一去世后，河南官民请祀尹会一于名宦祠，颂声颇著。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高宗的谕令中，尹会一却被归为“持禄尸位之辈”，乾隆五年（1740 年），高宗斥责尹会一“闾茸委靡，苟且因循”，“实未见其悃悞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也”。<sup>③</sup> 令人颇感矛盾的是，这则谕文的主旨原本在于劝诫督抚大吏以教、养二端为重，这是乾隆对御史沈世枫奏言督抚好大喜功、邀宠媚上的正面回应。谕文对尹会一“闾茸委靡”的断语，应指其“自任豫抚以来，属员怠忽，不知畏惧”，“谳狱弭盗，多未妥协”<sup>④</sup> 等。可见帝王虽称言“治天下之道，莫大于教养二端”，<sup>⑤</sup> 但在真正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时，以化民成俗为主的传统的“行道”式地方治理模式似乎处于明显劣势。这固然是尹会一个人的不幸，但也反映出传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在此时的颓然失势。

雍乾时期的理学官僚应如何自救以力挽颓势？儒理之臣该如何作为方可向上谋求政绩、获得生存空间，向下为民请命、不枉儒臣身份？归根结底，这关系到清雍乾时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的进化与转型。

虽然从广义而言，清代凡是科举进身者皆可称为理学官僚，但本文所谈的理学官僚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sup>⑥</sup> 这一群体因恪守程朱之学而更多地倾向于人心与治体，重视根据理学宗旨整饬基层教化，强调敦厉风俗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长期以来，理学官僚在社会治理和维持政治秩序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进入 18 世纪，诚如马子木所说：“随着国家治理的日益精细化，诸如水利、农桑等较为专门性、技术性的知识，亦被视作为官之必需而进入

① 吕焜编次，方苞阅定：《尹健余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1 页。

② 参见尹会一著，张受长编：《尹少宰奏议》，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9~81 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 123，乾隆五年七月庚寅，《清实录》第 10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806 页上栏。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04，乾隆四年十一月庚戌，《清实录》第 10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566 页上栏。

⑤ 《清高宗实录》卷 123，乾隆五年七月庚寅，《清实录》第 10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806 页下栏。

⑥ 马子木：《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历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41 页。

理学官僚的知识世界，实学中经济乃至治理技术的层面被日益凸显。”<sup>①</sup>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迎合皇权政治文化，拓展自我生存空间，部分理学官僚开始在处理地方政务的过程中，主动将目光延伸到技术领域。他们由此兼备了技术官僚的行为特征，成为清代官僚治理模式转型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清雍乾时期的技术官僚不仅具有传统理学官僚重视人心、治体的特点，能够基于道德践履阐发实学论，而且可根据时务之所需，在政治、经济领域贯彻技术性政策，以此谋取生存空间。

关于清雍乾时期官僚治理模式的转型问题，一般认为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得益于其自身推崇的经世之学。<sup>②</sup>具体来说，理学官僚从现实需要出发，将河工、漕运等方面较为专门的知识纳入实学的范围，这是转变的内在因素；<sup>③</sup>而18世纪理学官僚面临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则是转变的外在推动力。<sup>④</sup>这种解释当然言之有理，但并不能完全反映雍乾时期地方治理中，传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向技术官僚治理模式转型的全部内容。若将理学官僚的此种转型置于较长时段去理解，不难看出，这当是雍乾时期地方治理的题中之义，是理学官僚群体谋取生存空间，进而实现“内圣外王”的应行举措。所以本文的主题，即基于清代理学官僚的政治生存状况，重点阐释雍乾时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在地方政治运行中的转型，并对这一过程在不同时段的特点与变化予以分析和说明。

## 二、清代前期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

清代前期理学官僚“由实学兴教化”的地方治理模式是儒理之臣根据政权建设所需，对传统儒家从人心到治体的政治理念的承袭与践履。顺康时期，基层社会从经济民生到社会秩序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紊乱，“蓬蒿满路，鸡犬无声”，<sup>⑤</sup>“民不聊生，饥寒切身”，<sup>⑥</sup>“起而为盗”。<sup>⑦</sup>在这样的时代背

① 马子木：《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48页。

② 参见刘凤云：《十八世纪的“技术官僚”》，《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8~19页。

③ 参见马子木：《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62页。

④ 参见刘凤云：《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6页。

⑤ 谷应泰撰，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07页。

⑥ 《清世祖实录》卷75，顺治十年五月己卯，《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93页上栏。

⑦ 《清世祖实录》卷125，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丙子，《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67页上栏。

景下，恢复生产、端正民风等无疑是地方政治的要务。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发布的“圣谕十六条”对清代政治影响深远，其内容涉及教化、风俗、刑罚、农垦、催科、诉狱、弭盗等诸多方面，传达了清廷对地方治理的基本理念。<sup>①</sup>又康熙十年覆准，“民间农桑，令督抚严饬有司，加意督课，毋误农时，毋废桑麻”。<sup>②</sup>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谕令规诫地方官吏劝课农桑、敦风厉俗，务求休养生息以恢复社会秩序，由此可见一斑。

为贯彻王朝政令，理学官僚在施行休养生息政策、恢复社会秩序方面表现积极。康熙时期，陆陇其任嘉定知县，因当地“赋多俗侈”而“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sup>③</sup>为官“慈惠廉平，一尘不染”，陆陇其“去官之日，小民焚香攀送，巷无居人”；<sup>④</sup>江苏巡抚汤斌“宽民力、兴教化”，以“培植根本为务”；<sup>⑤</sup>直隶巡抚李光地“恤民之隐，尤尽心于农田水利”；<sup>⑥</sup>张伯行“所至平糶赈饥，褒廉纠墨，问民疾苦，宣布朝廷德意”，<sup>⑦</sup>任福建巡抚期间，他“访求闽中士有行谊博闻好古者，令郡县资送，延入学舍，给衣服资用。公每月中三四至，与讲论儒先为学之旨，修己治人有用之学。所成就人材甚众”。<sup>⑧</sup>康熙对张伯行大加赞赏，谓之“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sup>⑨</sup>另据《榆巢杂识·理学名臣》：“康熙初，圣教涵淳，人才蔚起，一时如张文端、魏敏果、熊文端、汤文正、张清恪、李文贞，皆崇尚理学，践履笃实。”<sup>⑩</sup>理学名臣当是清代文人阶层冠予理学官僚精英群体的殊荣。

康雍乾时期颇负盛名的理学名臣朱轼也值得一提。朱轼于康熙三十三年

①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34，康熙九年十月癸巳，《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61页上、下栏。

② 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68《户部·田赋·劝课农桑》，《续修四库全书》第8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94页上栏。

③ 《清史稿》卷265《陆陇其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34页。

④ 潘耒：《遵谕陈言疏》，贺长龄辑，魏源编次，曹培校勘：《皇朝经世文编》卷13《治体七·用人》，《魏源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79页。

⑤ 徐乾学：《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钱仪吉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16，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4页。

⑥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钱仪吉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13，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6页。

⑦ 沈近思：《诰授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加二级赠太子太保谥清恪仪封张先生墓表》，钱仪吉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17，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3页。

⑧ 朱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张清恪公伯行神道碑》，钱仪吉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17，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9页。

⑨ 费元衡：《诰授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加二级赠太子太保谥清恪敬庵张先生行状》，钱仪吉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17，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1页。

⑩ 赵慎畛撰，徐怀宝点校：《榆巢杂识》卷上《理学名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页。

考取进士，曾先后外任湖北、陕西、奉天、浙江等地官员，其施政重在人心、治体，“厚风俗”是其经理地方的基本要旨。康熙五十九年，朱轼迁转回京，享有声名，宦途稳固。<sup>①</sup>雍正二年，世宗因朱轼与沈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钦选二人合编“州县事宜”，<sup>②</sup>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朱轼在康熙时期采取的地方治理模式的认可。

我们认为，理学官僚的政治生存不仅指持官获禄、获取政绩，而且体现了他们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想——施政为民，追求长治久安。陆陇其、汤斌、李光地、张伯行、朱轼等施行的“由实学兴教化”的治理模式，顺应了清代前期的政治需求，是理学官僚践行儒家至高理想的直观表现。与此互为表里，皇权亦赋予理学官僚应有的政治地位。总之，由于在清代前期恢复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突出贡献，理学官僚有效拓展了自己的政治生存空间。

### 三、从理学官僚到技术官僚：雍乾时期的地方治理新模式

雍正四年，直隶总督李绂参奏河南巡抚田文镜“性情僻暗，信用佞邪，贤否倒置”，控诉其重用无赖张球为上蔡知县，并听信张球谬论，弹劾进士出身的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诚等人。<sup>③</sup>李绂，康熙四十八年进士，被梁启超誉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sup>④</sup>曾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广西巡抚、直隶总督等职，<sup>⑤</sup>是清代著名的儒臣。田文镜则是监生出身，较少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治理地方时唯帝王意志是从。也就是说，李绂与田文镜在为官之道、施政方法上有所不同。在事态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即便李绂参奏田文镜的一些内容被证明属实，雍正也依然对田文镜百般维护；<sup>⑥</sup>而对李绂，雍正则在朱批中称：“今日有此，

① 参见《清史稿》卷289《朱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43~10244页；朱轼：《朱文端公文集》卷1《上谕注解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58页下栏至459页上栏。

② 参见田文镜：《州县事宜》，《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3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660页下栏至661页上栏。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上栏。

④ 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7页。

⑤ 参见《清史稿》卷293《李绂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21~10323页。

⑥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51，雍正四年十二月乙丑，《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764页上栏至766页下栏。

在李绂而不在田文镜也。”<sup>①</sup>可见雍正对传统儒臣的施政方式似乎并不感兴趣。此外，虽然雍正起初钦选了理学名臣沈近思、朱轼编纂“州县事宜”，但在雍正七年，他却以沈近思物故、朱轼多病为由，将“州县事宜”的编纂者最终更换成了李卫与田文镜。<sup>②</sup>这种变动也从侧面说明，传统理学官僚的治理模式在新的时局下或已不再受到重视。因此，对理学官僚群体而言，为充分获取生存空间，实现其政治抱负和价值理想，寻求进化与转型是势在必行的。

宽泛而论，凡是贯彻技术以及技术性政策于政治事务的官员，皆可谓技术官僚。但本文关注的并非雍乾时期所有的技术官僚，而是其中传统、典型的理学官僚，研究这一群体向技术官僚的转化与升级。实际上，儒吏迫于生存向技术官僚靠拢，早在汉代就已颇见端倪。汉代重吏治，虽然主观上并不排斥儒生，但儒生若“便习官事”，则其宦途会更加通达顺利。<sup>③</sup>到清雍乾时期，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进化，或者说清代儒生对技术的贯彻，比之汉代更加深入彻底。这不仅是雍乾时期理学官僚新的发展动向，而且属于时代之显象。高王凌曾基于18世纪的“理学家”列举彼时的经世官僚，便凸显了这一群体在经世方面的重要倾向。<sup>④</sup>

清雍乾时期，由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成功转型的代表人物有朱轼、孙嘉淦、顾琮、高斌、张师载、陈宏谋、杨锡绂等。<sup>⑤</sup>本文重点关注朱轼及其两位门生陈宏谋、尹会一，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具有关联性，而且其官阶与学术皆显耀于当世，但是三人的宦途发展却不尽相同。故而将此三人进行对比，以分析清雍乾时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的转型，无疑非常具有代表性。

需要说明的是，朱轼虽然是理学名臣，在治理地方时也确实比较关注人心与治体，但他在康熙五十九年时，就凭借政绩内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从而得以免于雍正即位后，政治文化在用人铨选方面的转变给理学官僚（特别是其中的地方官员）带来的冲击。另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朱轼早在康熙年间就积极地将技术性政策贯彻于政治事务中，由此兼具了技术官僚的身份，这是他继续受到雍正重用的根本原因。

朱轼在康熙五十七年治理浙江时，一方面“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8页下栏。

②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92，雍正八年三月壬申，《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31页下栏至232页上栏。

③ 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④ 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年第1期，第154~157页。

⑤ 必须指出的是，并非奉理学为圭臬的官员皆具备这种倾向，德沛之辈亦非鲜见。

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sup>①</sup> 另一方面针对加固江南海塘创造性地提出了“木柜法”，即“以木为柜横贴塘底，实以碎石以固塘根。又用大石高筑塘身，附塘另筑坦水石以护塘脚，毋使潮水浸入”。<sup>②</sup> 这次技术改进卓有成效，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海塘工程修筑得十分坚固，因此直到雍正十三年仍得到杭州将军傅森的赞赏：“自李家村至海宁县迤西大石堤之尾，垫木枝修筑之柴塘堤，十分内被风潮冲塌七、八分。再，大学士朱轼任浙江巡抚之时，所修筑之海宁县以西五百丈大石堤，毫无冲坏之处。”<sup>③</sup> 由此可见，在康熙执政末期，朱轼就已具备了技术官僚的行为特征；而进入雍正朝后，他的这种特征变得愈加显著。雍正二年，浙江出现特大海潮，朱轼奉旨驰驿前往浙江主持塘工。<sup>④</sup> 雍正十三年，朱轼因同样的情况又一次前往浙江，<sup>⑤</sup> 后虽因世宗驾崩未能成行，但他屡次在关键时刻受到重用，体现了统治者对其技术官僚身份的承认。此外，雍正三年，朱轼还曾以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身份，请命前往直隶查勘营田水利，他结合畿南实际，先后奏表《查勘畿南水利情形疏》《畿南请设营田疏》，<sup>⑥</sup> 世宗允行照办。到雍正四年秋季，“田成岁稔，凡一百五十顷有奇。而民间之闻风兴起，自行播种者，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丘，共七百一十四顷有奇，皆于积潦停沕中随方插蒔，尽获收获。于是争求节水疏流，以成永利”，<sup>⑦</sup> 这是朱轼将技术性政策成功贯彻于地方政务的又一明证。

陈宏谋是乾隆时期典型的技术官僚，他担任陕西巡抚期间，除沿袭其以往的理学官僚模式，重视教育与教化外，还在乾隆十年针对陕西粮食匮乏的情况颁布《劝民领种甘薯谕》，提出“从江、浙、豫、蜀各省购觅薯种，并

① 钱泳著，孟斐校点：《履园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1~3242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三月戊寅，《清实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727页上栏。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381页。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上栏。

⑤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58，雍正十三年七月丙辰，《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39页下栏。

⑥ 参见朱轼：《查勘畿南水利情形疏》《畿南请设营田疏》，贺长龄辑，魏源编次，曹培校勘：《皇朝经世文编》卷108《工政十四·直隶水利中》，《魏源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12~116页。

⑦ 《营田四局工程序》，贺长龄辑，魏源编次，曹培校勘：《皇朝经世文编》卷108《工政十四·直隶水利中》，《魏源全集》第19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9页。

雇有善种之人到陕”，<sup>①</sup> 强调因地制宜，推广甘薯种植。此外，乾隆十一年、二十二年，陈宏谋颁布《通查放养山蚕檄》《续行山蚕檄》，募请山东、河南、江浙等地养殖经验丰富者向陕西农民传授蚕桑技术；<sup>②</sup> 乾隆十三年、十六年，陈宏谋颁布《兴除事宜示》《劝种桑树檄》，“招集南方机匠”来陕传授纺织技术；<sup>③</sup> 乾隆二十年、二十二年，陈宏谋颁布《申行蚕织檄》《筹拨蚕馆工本檄》，规划、协调蚕桑技术推广过程中所需的经费、人力等资源。<sup>④</sup> 凭借这些举措，陈宏谋改变了长久以来“秦中无衣”的窘迫状况，并使关中地区的蚕桑业一度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sup>⑤</sup> 此外，乾隆十五年，陈宏谋还重新启动了陕西地区的凿井灌田水利计划，根据当地的地理水文特征，从容不迫地有序开凿，有效缓解了陕西农田的用水困难，提高了陕西农业生产的抗旱能力。<sup>⑥</sup> 陈宏谋对技术的高度重视，也使他颇有盛名，彭启丰为陈氏撰写的墓志铭便评价道：“公固未尝以学自名，而人之推公者，覩于其政而知之也。”<sup>⑦</sup> 因应于此，陈宏谋在乾隆时期的政治生存空间也逐渐扩大，先是成为封疆大吏，晚年又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sup>⑧</sup> 可谓深受乾隆器重。

尹会一亦曾在担任河南巡抚期间，为解决河南的人地矛盾而引入精耕技

- 
- ①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22《劝民领种甘薯谕》，《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32页上栏。
- ② 参见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24《通查放养山蚕檄》，《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页下栏；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39《续行山蚕檄》，《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下栏至213页上栏；《清史稿》卷307《陈宏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61页。
- ③ 参见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27《兴除事宜示》，《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3页上栏；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30《劝种桑树檄》，《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下栏。
- ④ 参见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35《申行蚕织檄》，《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上、下栏；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39《筹拨蚕馆工本檄》，《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上栏至209页上栏。
- ⑤ 参见李富强、高倩：《陈宏谋与陕西蚕政研究——兼论其与杨岫的交往》，《中国农史》2019年第4期，第73页。
- ⑥ 参见陈宏谋：《通查井泉檄》，贺长龄辑，魏源编次，曹培校勘：《皇朝经世文编》卷38《户政十三·农政下》，《魏源全集》第15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87~188页。
- ⑦ 彭启丰：《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陈文恭公宏谋墓志铭》，钱仪吉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27，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01页。
- ⑧ 参见《清史稿》卷307《陈宏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59~10560、10563页。



术。乾隆二年十月，尹会一上《敬陈农桑四事疏》，所谓“四事”，其一，“天时之宜乘”；其二，“人力之宜尽”；其三，“树艺之宜广”；其四，“女工之宜勤”。具体而言，尹会一指出当时河南的农耕技术存在简单粗放的缺点，认为河南农民“罔知节候”，“惟图广种”，并提出了应当进行精耕细作的主张——“应令地方官劝谕田主，多招佃户，量力授田，每佃所种不得过三十亩”，<sup>①</sup>旨在以“力专”代替“广种”，通过劳动力的集约投入提升河南的农业生产效率。然而，揆诸现有史料，此后直到乾隆四年十一月尹会一请辞侍母，始终未见河南以“力专”代替“广种”来提高亩产量的相关记载。尹会一只是在乾隆三年十二月上《奏报栽树成数疏》时汇报了“四事”中第三项“树艺之宜广”的工作进度，称河南当年栽植成活的树木共一百九十一万余株。<sup>②</sup>尹会一对农业“力专”的执行情况避而不谈，或许可从侧面证明其目标并未实现，但即便如此，尹会一也依然是乾隆时期理学官僚试图向技术官僚转型的代表，只是比之朱轼、陈宏谋，尹会一的转型没有那么顺利。

实际上，尹会一和陈宏谋同为理学官僚，相似之处颇多。首先，尹会一在乾隆二年受命担任河南巡抚，陈宏谋则在乾隆六年被擢升为江西巡抚，二人均在乾隆初年成为地方大员，故而受到同样的皇权政治文化的影响。其次，二人皆是朱轼门生，为政之道与座师朱轼颇为相似，尤其是尹会一，他曾在担任襄阳知府时，以书信方式向朱轼表达了其个人对践履理学于民生经济的向往，并称希望得到朱轼的教诲与指导。<sup>③</sup>尹会一升任扬州知府后，朱轼赠之以亲编的《历代名臣传》，切嘱尹氏学习历代名臣治政之精髓。<sup>④</sup>不过，就政治际遇而言，尹会一比陈宏谋要坎坷得多。虽然陈宏谋也曾受到乾隆的斥责，但他在技术性政策的贯彻实施方面相对成功，其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身份转型过渡平稳，所以陈宏谋的政治生存空间可以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反观尹会一，他在乾隆五年正式卸任河南巡抚后，一直到乾隆十一年才被重新启用为江苏学政，且最终止步于此，再也无缘担任地方民政官。由此可见，乾隆时期地方官僚的技术性政策不能只停留在纸面

① 参见尹会一著，张受长编：《尹少宰奏议》卷3《敬陈农桑四事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28页。

② 参见尹会一著，张受长编：《尹少宰奏议》卷6《奏报栽树成数疏》，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58页。

③ 参见尹会一：《健余先生别集》卷1《上朱高安先生》，《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38页下栏。

④ 参见尹会一：《健余先生文集》卷5《上朱高安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2页下栏至653页上栏。

上，其实际成效决定了官僚个人的宦途走向。

除了朱轼、陈宏谋以外，理学名臣高斌亦是清代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成功转型的代表。高斌曾在雍正十三年到乾隆十八年间三次担任江南河道总督，其间奏请疏浚黄河南岸砀山毛城铺、萧县王家山、睢宁县峰山等处引河；提议于淮扬运河清口至瓜洲段的天妃、正越两闸下，“相距百余丈，各建草坝三。坝下建正石闸二，越河石闸二。又于所建二闸尾各建草坝三”，以应对洪泽湖水位的异常上涨；主张开凿新运口，堵塞旧运口，避免黄河倒灌；“设立徐州水志”，以确定各处闸坝的开闭时机。在上述治水举措中，高斌展现了其作为技术官僚的一面。对于高斌的治水成效，乾隆有“颇著劳绩”的赞誉，认为他在一众河臣中，虽不如靳辅，但“较齐苏勒、嵇曾筠有过无不及”。<sup>①</sup>

若我们将清雍乾时期理学官僚的为政措施与其对政治生存空间的谋取相联系，便不难发现理学官僚虽然需要通过种种举措贯彻君主意志，但在此过程中，也会将其政治抱负经由内在的自觉性释放出来，从而使他们在处理及解决民生问题方面成为“专家”。<sup>②</sup> 故而对技术的选择和运用，一方面是理学官僚拓展政治生存空间的切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践行经世要旨、实现个人政治价值的直观体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清雍乾时期的技术官僚治理模式作出如下阐释：雍乾时期，由于政治文化的转变，地方政治进入新的阶段，朱轼、陈宏谋等部分理学官僚在保留原有的政治特性的同时，主动对统治者加以迎合，将技术性政策付诸地方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以此谋取政绩，并为民解忧，进而实现个人政治价值。

#### 四、雍乾时期地方治理模式转型的政治逻辑与时代意义

清雍乾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既存因素共同催化了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型。这意味着，对雍乾时期地方官僚治理模式的嬗变，不能孤立地理解与分析。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技术官僚的大量涌现，既是政治文化转变的产物，是补益时务急需的，也是在经世学理念指导下，理学官僚谋求政治生存时的自我进化。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充分结合历史背景，以官僚政治为本，更加深入地解读雍乾时期理学官僚治理模式转型的政治逻辑与时代意义。

帝王意志的变化自然是雍乾时期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型的主要政治文化因素，它提供了理学官僚治理模式转型的客观政治条件。一般认为，理学

<sup>①</sup> 参见《清史稿》卷310《高斌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29~10634页。

<sup>②</sup> 参见刘凤云：《十八世纪的“技术官僚”》，《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20页。

官僚没有追求经世致用的主动权，而必须仰仗君主，他们在此情况下只能“待”。<sup>①</sup>雍正即位之后，清代的皇权政治文化在用人铨选方面出现了新的动向。雍正不喜康熙时期颇受重视的“由实学兴教化”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相较于中正平和的儒臣风范，他更青睐勇于任事、以实务为主的政绩斐然的能吏风格。与此相对应的是，清廷考察地方文官政绩、实施升降黜陟的大计“四格”，从康熙时期的“守、才、政、年”，调整为雍正时期的“守、政、才、年”。<sup>②</sup>其中“政”的位置上升，是皇帝看重地方文官政绩在制度层面的直观体现。在此制度反映的精神和原则之下，敦风厉俗等耗时费力的地方政务逐渐遭到忽视，而理学官僚却向来重视整饬风俗与教化人心，认为这是地方官为政的根本，如沈近思便曾说：“风俗渐好，下面事便轻减了一半。”<sup>③</sup>所以在雍正时期，传统的理学官僚较难迎合帝心，当时深受帝王喜爱的多是能吏，如田文镜、李卫、王士俊等。一旦涉及朝堂斗争，在传统的理学官僚和能吏之间，皇权往往不会倾向前者。

乾隆即位之后，清代的政治文化虽然出现了一些向康熙朝回归的迹象，乾隆也试图将康熙与雍正两位帝王的政治风格融为一体，但揆诸现实，由于社会矛盾不断发酵，为维持既有统治秩序，地方政治总体上仍须沿着雍正时期的既定轨道持续向前。同时，乾隆个人亦注重实学，认为“学皆实学，行之事业，治皆实功”，“愿诸臣研精宋儒之书”，以“有功于世道人心者，显著于家国天下”。<sup>④</sup>乾隆七年，素有理学名望的两江总督德沛因治河不力被乾隆斥责：“若不勤理政务，实力拯救灾黎，而空谈道学，实属无益也。”<sup>⑤</sup>史载德沛每到一处任官，必立书院以聚徒讲学，他视人心为风俗之本，曾言：“今世不患乏才，而患人心之不复古，非讲学无以明之。如使风化日移，胜纷据于啾唔之学多矣！”<sup>⑥</sup>由此可见，德沛是名副其实的厚风俗、重教化的理学名臣，他之所以受到乾隆的斥责，或许是因为其为政之道与乾隆心目中的治世之道相去甚远，乾隆便以治河不力为由，表达其对德沛等传统理学官僚奉行的地方治理模式的不满。

① 参见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历史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137页。

② 参见常越男：《清代官员考课中的“四格八法”》，《历史档案》2011年第4期，第42页。

③ 沈近思：《天鉴堂集》附载《励志杂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81页下栏。

④ 《清高宗实录》卷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清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76页上、下栏。

⑤ 《清高宗实录》卷177，乾隆七年十月，《清实录》第11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84页上栏。

⑥ 昭槤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卷2《德济斋夫子》，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

毋庸置疑，无论是帝王意志的变化，还是理学官僚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均非凭空而起。关于后者，罗威廉对陈宏谋的研究已表明，在治理地方时，所谓18世纪的“正统精英”需要处理的问题极具多样性；<sup>①</sup>高王凌则强调同一时期的“经世家”对涉及范围极广的人口问题的密切关注。<sup>②</sup>我们在理学官僚处理的众多地方政务议题中，选取了农业生产与河工、海塘治理——二者集中体现了理学官僚对技术性政策的贯彻，因而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探究彼时政治文化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人口对耕地和粮食产量造成的压力主导了清雍乾时期的社会变化。乾隆六年，中国人口在官方记载中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sup>③</sup>人口增长导致对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但实际上在康熙后期，各省已无多少可垦之地。雍正即位之初便坦言：“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sup>④</sup>雍正十三年朱轼奏称：“我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通都巨邑，无一隙未耕之土。”<sup>⑤</sup>耕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总量趋于恒定，而人口增长却具有长期稳定性，因此彼时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人口与耕地之间。人地矛盾影响百姓的基本生计、政府的税赋征收以及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而在人口激增、耕地有限的背景下，要缓解这一矛盾，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加以改进。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优化技术来应对人地矛盾的做法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农业从事者和管理者早已认识到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是解决人地矛盾的关键所在。<sup>⑥</sup>只是在清雍乾时期，由于人地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官僚群体对这方面更加关注。彼时理学官僚在人心与风俗之外，尤为注重结合地方政治所需，将技术贯彻落实于农业生产，如朱轼在直隶推广营田水利技术，陈宏谋在陕西推广凿井灌田与蚕桑养殖技术，尹会一在河南推广精耕技术等，皆是明证。概言之，农业生产成为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型的重要场域之一。

除了农业生产外，河海治理对民生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在地方政治中同样极具分量。在18世纪的技术条件下，河海治理的难度自不待言，且河海

① 参见[美]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 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年第1期，第150页。

③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57，乾隆六年十二月，《清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256页下栏。

④ 《清世宗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癸丑，《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72页上栏。

⑤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卷92，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8页。

⑥ 参见薛国中：《16至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87页。

水利工程之所以深受技术官僚关注，也与这一时期水患频发带来的巨大损失密不可分。具体而言，一方面，水患频发迫使水利工程的营建持续不断，而大量的工程必然需要巨额经费支持；<sup>①</sup>另一方面，水患还会破坏地方生产关系，引起粮价的陡升，从而构成对地方治理的压力。譬如雍正二年七月江南遭到风暴潮袭击，尽管清政府采取了种种救济措施，但在雍正二年十月到雍正三年五月间，苏州、杭州等地的粮食价格仍要比丰年的同期价格高出许多。<sup>②</sup>故此，雍正二年十二月，世宗针对浙江塘工下达了“海塘关系民生，必须一劳永逸”<sup>③</sup>的谕令；雍正五年，世宗在论及江苏水利时亦强调“开浚水道，为久远之计”；<sup>④</sup>此后针对黄河水务和江苏塘工，世宗又于雍正七年和雍正十年作出了同之前类似的要求。<sup>⑤</sup>雍正对“一劳永逸”治水理念的强调，表明了河海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雍乾时期的理学官僚同样高度重视河海治理。如陈宏谋在天津道任职时，撰写《放淤事宜七则》<sup>⑥</sup>作为治理南运河的指导性原则，并实现了“水涨挟沙行，导之从堤左入、堤右出。如是者数四，沙沉土高，沧、景诸州悉成沃壤”<sup>⑦</sup>的目标。出任江苏巡抚后，陈宏谋依然“尤专意水利”，取得了“疏丁家沟，展金湾坝，浚徐六泾白茆口，泄太湖水，筑崇明土塘御海潮，开各属城河”<sup>⑧</sup>的成绩。除陈宏谋以外，还有不少理学官僚在河海治理方面颇有所成，如孙嘉淦、顾琮整治永定河，<sup>⑨</sup>杨锡绂禁止陂塘改垦，<sup>⑩</sup>等等。他们以分布于各地的江河湖海为场域，逐步实现了向技术官僚的转型。

帝王意志与地方政务的实际需求，是雍乾时期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型

- 
- ① 参见刘风云：《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28页。
- ② 参见陈亚平：《雍正时期江浙风暴潮与政府应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5期，2014年，第46页。
-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上、下栏。
- ④ 《清世宗实录》卷56，雍正五年四月辛亥，《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63页上栏。
- ⑤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88，雍正七年十一月甲戌，《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77下栏；《清世宗实录》卷121，雍正十年七月庚戌，《清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02页上栏。
- ⑥ 参见黎世序、潘锡恩：《续行水金鉴》卷110《运河水》，《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8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下栏。
- ⑦ 《清史稿》卷307《陈宏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60~10561页。
- ⑧ 《清史稿》卷307《陈宏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62页。
- ⑨ 参见《清史稿》卷303《孙嘉淦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486~10488页；《清史稿》卷310《顾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37~10639页。
- ⑩ 参见《清史稿》卷308《杨锡绂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85、10588页。

的客观因素，而这一时期的经世学，作为理学官僚的内在信念，当为其实现转型的主观驱动因素。和卫国认为，18世纪的理学依然需要通过一批官僚践行其经世的原旨，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则集中体现了此时经世学的价值取向；<sup>①</sup> 马子木进一步指出，18世纪的技术官僚，如高斌、顾琮、张师载、杨锡绂等，均具有朱子学的学术渊源。清初理学官僚虽亦讲求实学，但主要是基于儒家道德践履以阐发实学论，而雍乾时期的理学官僚则明显更加关注实学中的技术层面。<sup>②</sup> 因此，经世学便成为雍乾时期理学官僚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依归。如陈宏谋曾许下“以醇儒之学术，发为名臣之经济”和“本经术以经世，言近而指远”<sup>③</sup> 的愿望，杨锡绂也力行“本诸学问以见经济”，<sup>④</sup> 这体现了雍乾时期的“学问”不仅指学术造诣，而且包括专业性较强的经世知识。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那些成功实现向技术官僚转型的理学官僚，在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和践行经世济民理念方面，应是当时整个官僚群体中的佼佼者。

考之文献，经世致用理念并非在清雍乾时期才出现，北宋胡瑗已有“明体达用”之说，<sup>⑤</sup> 明代晚期的东林党人也大多倡导经世思想，至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反思明朝政治得失之时，更是将经世理念推至高峰。那么，经世学为何没能在当时就催生出技术官僚群体？脱胎于理学官僚的技术官僚群体缘何在清雍乾时期才开始涌现？究其原因，一方面，雍乾时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经世学因此担负起应对时代危机的重责，并强势占据了理学官僚知识世界的主要部分，成为理学官僚转向技术官僚的义理导向；另一方面，清代中前期，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森严，屡屡大兴文字狱，理学官僚通过注经、论史等方式表达政治关怀与悲悯意识，不时招致杀身之祸。<sup>⑥</sup> 所以在清雍乾时期，许多理学官僚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从思想文化领域淡出。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理学官僚将空余的思绪与精力投注到政治实践中，把“学”与“事”相结合，再延伸、施加于“仕”，似乎为其毕生所学找到了最佳归宿。陈宏谋曰：

① 参见和卫国：《理学官僚杨锡绂与18世纪理学经世》，《兰州学刊》2006年第7期，第45页。

② 参见马子木：《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48页。

③ 陈宏谋：《培远堂手札节要》，《陈榕门先生遗书》第2册，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年版，“序”，第1页。

④ 杨锡绂：《漕运则例纂》，《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3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259页下栏。

⑤ 参见黄宗羲著，缪天绶选注：《宋元学案》，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6页。

⑥ 参见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史林》1995年第1期，第73~77页。

学者所以学为人，即以讲求乎仕之理也；仕者所以治民事君，即以实践乎学之事也。事、理本属相资，体、用原归一致。世之学者，每歧而二之于古人嘉言善行，不能切己体验，书自书而我自我，遂至学自学而仕自仕。<sup>①</sup>

陈宏谋认为，“理”与“事”之关系堪比“体”与“用”，二者密切相关，并且相互促进，学者应将“学”付诸“治民事君”的实践中，实现“学”与“仕”之间的良性循环。作为陈宏谋的座师，朱轼自然同样力主“经”与“事”的紧密结合，认为“经”是治事之要理，“事”为阐发经学之土壤，<sup>②</sup>二者互为表里、彼此成就。在《历代名臣传序》中，朱轼讨论了圣王之学、道德以及功名的基本关系，将之概括为“天生圣贤以为天下，未有功名不本于道德，亦未有道德而不发为功名者”，<sup>③</sup>即“学”当内蓄为道德、外发为功名，圣学是功名之本源，功名则为圣学之外在表现，强调理学的经世致用性及其在道德与事功方面的本源性。正因为如此，朱轼极其关注历史上著名的技术型人才，在其著作《史学三编》中，郭守敬因精于水利技术而被朱轼纳入名臣的范畴，循吏张伦、韦景骏、裴延俊等也都因有功于农田水利而入选，这些显然是朱轼重视技术的表现。要之，清雍乾时期的理学官僚不仅很好地领悟了“学”与“仕”的关系，明确了贯彻技术性政策对政治前途的重要性，而且从义理层面为自身行为提供了充分理据。

##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由实学兴教化”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适应于百废待兴的清初初年。然而，进入雍乾时期后，地方政治因人地矛盾升级而承受了更大压力，现实对官僚政治提出了更高要求，故亟须对原本以敦风厉俗、兴行教化为重点的理学官僚治理模式做出调整。这一时期，理学官僚通过经筵会讲教化帝王的努力亦持续受挫，不仅讲官的帝师之位出现动摇，而且一般士人也已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其掌握儒家道统的能力。再加上文字狱的思想钳制以

① 陈宏谋辑，陈乃宣、许虹点校：《学仕遗规》，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叙”，第1页。

② 参见朱轼：《史传三编》卷3《胡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页上栏。

③ 朱轼：《朱文端公文集》卷1《历代名臣传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70页下栏。

及帝王对士人关于历史书写的规训，更使他们自觉地舍弃了褒贬历史的权利。<sup>①</sup>当思想文化领域的萎缩与补益时务的现实需要同时产生影响时，理学官僚群体便在经世学的驱动下，以实现自我政治价值与拓展生存空间为要旨，通过在地方政务中贯彻技术性政策，开始出现向技术官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理学官僚对新技术的推广也起了一定促进作用。<sup>②</sup>

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型，一方面体现了官僚为皇权服务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其自身的价值追求。比如朱轼在注重运用技术和专业知识处理地方事务的同时，还撰著了《历代名儒传》和《历代循吏传》来彰显其儒臣情怀；陈宏谋亦始终坚持“天下之风俗，征于人心，人心厚，则礼让兴而讼端息”<sup>③</sup>的理念。所以像朱轼、陈宏谋这样的技术官僚，正是理学官僚通过自我完善实现转型的突出代表，他们拥有强烈的事功意识，因此可以在察觉到政治文化的风向出现变化后，充分利用皇权赋予的权力，顺时应势地进行角色转变。这一过程既体现了理学官僚的学旨所向，也是其谋取政治生存空间的具体表现。

技术官僚的存续基础在于他们是合乎政治目标和治理结构的技术合理性的载体，<sup>④</sup>清雍乾时期理学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型，即契合了当时的政治所需，只不过此类旧式技术官僚的身份往往被理学官僚等其他身份掩盖。随着“西学东渐”的愈演愈烈，传统的官僚政治受到强烈冲击，自洋务运动开始，在清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式技术官僚。他们作为18世纪技术官僚的后辈，既是“传统封建官僚体系中的新元素”，也是“近代西方科技向中国渗透的过程在制度上的反映”。<sup>⑤</sup>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07、314~316页。

② 参见〔法〕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③ 陈宏谋：《训俗遗规》，《陈榕门先生遗书》第10册，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年版，“序”，第1页。

④ 参见马陵合、吴方：《北洋时期技术官僚在产业行政中的定位——以铁路管理制度变革为背景》，《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141页。

⑤ 马乐、胡新和：《清代新式技术官僚群体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第5期，第36页。